

3
1985

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

武漢工運史料

前 言

我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斗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斗争中，我国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整套正确政治主张，指明了抗战胜利的道路，促成了全民族的团结，动员了广大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必胜的斗志。

抗战初期，武汉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武汉军民的安全转移，对向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输送干部，对民族工业的抢救和国统区后方战时经济的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国抗战史上爱国主义的光辉篇章。

现将郭述申等同志在抗战初期武汉工运史座谈会上的发言和马识途等同志抗战初期从事武汉工人运动的回忆录、访问记整理汇集发表，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并供各级工会对工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教育时参考。

目 录

前言

- 在抗战初期武汉工运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郭述申 (1)
- 在抗战初期武汉工运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陈用文 (11)
- 在抗战初期武汉工运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刘季平 (14)
-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在团
在武汉与蒋管区“中国劳协”建立统
一战线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回忆
.....廖似光 (27)
- 抗战初期武汉业余歌咏团工作情况
.....黄民伟 (34)
- 抗战初期我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的经过
.....马识途 (43)
- 汉阳兵工厂工人运动概况
.....吴正东 (48)

抗战初期大成纱厂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	郭 斌 (60)
武汉电信职工的抗日救亡运动	
.....	周叔康 (64)
抗战讲演室与女工识字班	
.....	陈光宇 (71)
抗战初期武汉工人运动概况	
.....	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74)

在抗战初期武汉工运史 座谈会上的发言

郭述申

这次召开这个座谈会，我是很高兴参加的，我很感谢全国总工会、湖北省委、湖北省总工会、武汉市委、武汉市总工会给我们提供了这样好的条件和机会。

抗战初期这一段工运史，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它是中国革命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到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转变时期。我们党在当时领导武汉工人运动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以及经验和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很好的总结。武汉抗战初期这一段工运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都是参加者、见证人。所以今天大家聚集在一起来研究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抗战初期武汉工人运动概况》，总的说来是写得好的。湖北省总工会和武汉市总工会的同志们，为这次会议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工作，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写出了这个文件。我认为这个文件可以作为我们这次座谈会研究的一个基础文件。抗战初期，武汉工运的情况是很复杂的。这个文件反映了当时工运的情况，反映了当时历史的事实；对于工运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一般情况来叙述，也作了一些概括和总结。这次会上还需要着重研究，今后还要继续加以研究总

结。

关于中共湖北省工委和省委的叙述，我补充一些情况和说明某些问题。

抗战开始，当我还在红军三十一军工作时，接到中央通知，派我到湖北省来工作。对我来说，从长期在农村工作突然转到大城市工作，环境完全是生疏的。我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到武汉，先见到董老，十月中旬，中央代表博古同志当面向我介绍了陶铸和钱瑛同志，并说明我们的工作任务是立即成立党的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陶铸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钱瑛任组织部长。至十二月工委扩大会议时，建立了临时省委，省委委员增至七人，先后成立了职工委、农委、青委、妇委、军委等。一九三八年一月，临委扩大会议后建立省委，委员由七人增至十一人。一九三八年六月，省委扩大会议，正式选举省委委员。其组成人员是先由我、钱瑛、王翰三人向中共长江局提名，经长江局批准后在省委扩大会议上通过，选出省委委员及候补委员十五人。

在省委扩大会议前，长江局组织部长博古同志在审查我们提出的名单时，一再通知我们说陶铸同志不能参加省委。他们认定陶铸同志不能参加省委所依据的“重要材料”，现在看来，是没有经过核实的。当时我们处在秘密工作环境，只有在组织上服从长江局，故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没有提名陶铸同志为省委委员。这个情况好多同志不了解，曾引起某些同志的误解，问：“陶铸同志是省工委的副书记，为什么不担任省委的委员？”陶铸同志以后没有参加省委就是这样的情况。当然，陶铸同志没有参加省委，对省委的工作是一个损失。陶铸同志在省工委成立后不久，由于民主人士石瑛、李范一的要求，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农村工作，经董老^①

批准，派他到应城汤池协助主办农村合作训练班。他在鄂中的工作是有贡献的。

省工委期间，宣传部长先由副书记陶铸同志兼，后由华岗、彭康同志担任很短一个时期。以后何伟同志任宣传部长直到武汉撤退前。省委的成员我现在记得的大概是这些：我、钱瑛、何伟、王翰、杨学诚、方毅、何彬、王亦清、郑位三、王致中、姜纪常、左觉龙，候补委员我只记起黄致祥，共十三人。我们分工如下：王翰接王亦清任秘书长兼职工委，农委开始是方毅，以后是何彬，青委是杨学诚，钱瑛兼妇委，我兼军委。我九月到延安列席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时，书记由钱瑛同志代理。你们的《抗战初期武汉工人运动大事记》上省工委成立时还有陶铸任省工委副书记，而《概况》里却没有写。

现在要对湖北当时的工运进行评价，就一定要对省委的工作进行评价。

湖北省委从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只有一年的工作时间，因为战局的变化，干部的调动频繁，省委成员分散在各地工作，未能及时总结工作。当时是秘密工作条件，行文很少，仅我和钱瑛同志向中央写了几份工作报告。如今省委的同志多已去世，我今天只能作为个人说说自己的意见，以供研究。

省工委成立后，面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武汉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虽然在国民党多方限制下，抗日热情和自发的抗日活动日益高涨。不久，上海、太原、南京相继失守，日军沿长江向西进犯，平津流亡学生、上海、南京救亡团体和爱国人士云集武汉，他们满怀挽救祖国危亡的热情和义愤，投身到武汉抗日救亡活动中来。这使省委获得大批力

量开展工作。自此，在武汉学生中、工人中，抗日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蓬勃发展起来。工委一开始就抓武汉建党工作同农村各县的建党工作、培养输送干部，为准备建立抗日武装和抗日游击根据地打基础。这些工作是有成果的。

在党的建设方面。省委是在我省经过长期白色恐怖，党组织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开始工作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何伟同志在天津入党回汉后，与两个同志建立了党的关系。抗战开始后，杨学诚同志受博古同志指派到武汉组成了武汉市工委，但未正式开展建党工作。省工委成立后，一开始就解决了武汉市和鄂西的自发党的组织问题。在徐州失守前近半年的时间里，在武汉市建立了三个区委、六个群团党团，还有带机密性的单位的党组织和个别党员，由省委直接管理。这些党组织的建立，加强了党对群众工作和重要工作部门工作的领导。在抓紧武汉市建党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地抓外地的建党工作。省委继续派于光远、谭友林，以后又派王致中到鄂西工作，派刘西尧到黄冈成立中心县委，派左觉农和安天纵到鄂北，派何彬到鄂南建党。当时在外地建党工作中遇到重重困难，如沔阳、阳新、大冶的反动派杀害了我们派去建党的同志。在鄂北建党，一次不成，再次派人去。当时我们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是很尖锐的。从一九三七年底到武汉失守前，对鄂东除郑位三在该地外，又陆续派方毅、何伟等同志去。对鄂中除陶铸、李华早在该地外，又派杨学诚等去做特委工作。这也是董老一再指示强调的。武汉快失守前，周恩来同志告诉王翰同志，改变调陶铸同志去湖南工作的决定，要陶铸仍留鄂中工作。这都说明董老和总理很重视老根据地的工作。

武汉沦陷后，鄂东和鄂中，发动了游击战争。鄂东在方毅、郑位三同志领导下，建立了第五大队和第六大队，由张

体学和罗厚福负责，用敌人进攻时国民党丢的枪支，壮大了队伍。在鄂中特委领导下，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都做得很好。他们建立和发展了抗日的武装部队，开展游击战，建立了一些分散的游击根据地。这些部队以后都成为抗战时期新四军五师的组成部份。

省委举办党员及干部训练班。派彭康、刘季平、余力金、聂鹤亭等在黄安七里坪开办了两期训练班，毕业后多数成为党的工作骨干。接着在汉口富源里办了四期党员训练班和几期党员短期轮训班。省委及长江局的一些同志亲自讲课。这些学员，除部分留本省工作外，其余分派到外省或军队以及服务团中去了。

省委为了开展城市和农村工作，也充分运用公开组织和群众团体与开明人士合作，放手发动群众。除支持救国会、民先、青救、女青年会等组织开展工作外，省委派刘季平、王洞若同志参加孔庚等知名人士筹组抗战教育研究会，他们办讲座、演讲室，在武大办游击战术研究班，掩护党的纱厂工作委员会，在工人和各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省委派了一批干部到新运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办的二十多个女工识字班去工作。派何彬、张执一、郭佩珊等到孔庆、黄松令等名流举办的湖北乡村工作促进会去工作，起草宣言、章程，办刊物，建立外县组织，开展了部分农村群众工作。派陶铸等大批干部到民主人士李范一的汤池农村合作训练班，训练的干部分到各县，对开展农村工作极为有利。派黄心学到鸡公山武大教授李相符办的林场去办训练班；派陈辛仁同志到航运训练班工作；派一些党员到国民党举办的专业技校去学习；输送不少力量到郭沫若同志主持的第三厅的宣传队、演剧队等文化团体中去，其中一部分也到农村去开展抗日工作。这

是省委正确执行统战政策取得的成果。

武汉抗战初期的工人运动和工运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大革命失败以后，武汉的工人并没有向敌人屈服，他们采用各种隐蔽形式同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进行斗争。他们怀念大革命时期的工会。他们虽有一小部分人受国民党的欺骗，但很多工人还是想方设法采取各种形式，甚至利用社会上一些旧的形式来团结组织自己的力量，同国民党、资本家作斗争。抗战开始后，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工人群众的抗日热情高涨。我们投了大量的干部去作工人工作。除了武汉本地的党员、抗日团体的积极分子骨干力量以外，从四面八方来到武汉的平津、上海、南京的流亡学生及各地来的服务团、演出队、宣传队、工作团等，向工人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组织工作，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建了工人的组织。武汉的工人阶级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在为自身的最低利益与国民党、资本家斗争中，在一些工厂里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并培养输送了一部分力量到延安、到农村、到需要技术力量的部门去工作，留下了一些力量在原工厂、企业里继续工作，后来，这些同志都成为各方面工作的骨干力量。这是应该肯定的。这些成绩的取得，应归功于这些参加实际工作的同志们，也包括今天在座的同志们。

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果，是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长江局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的具体指导，湖北各级党组织适应形势的发展，努力工作，展开一系列的斗争后取得的。我们处在国民党的统治区暂时的中心区。通过党中央公开发布的文章，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叶剑英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指导党的军事工作，选派李涛、聂鹤亭、边章五等同志在武汉和外地办各种训练班，讲抗战

形势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董老任长江局民运部长，经常向我们指出要大力开展农村工作，特别要对大别山、洪湖革命老根据地派得力干部去，为坚持抗战，发展人民武装打基础，并给省委不断介绍统战关系开展工作，所以省委决定在城市开展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农村工作，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坚持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还是明确的。

湖北省委一年工作的实践表明，我们是一般的按党中央的正确方针进行工作。我们工作成果的取得，决非是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所能办到的。

但是，我们省委对党内存在两种指导方针的斗争问题是没有认识的。

太原失守后，毛主席于十一月十二日在延安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纲)。当时王明在延安，他从延安到武汉来工作，一直没有向我们传达这个报告。(后来我们才知道，王明当时就反对这个报告提纲)。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要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这是整个抗日时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重要指导思想，而我们也缺乏警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产生的投降倾向的危险。我们对长江局根据国民党当局的要求，通知我们停办黄安训练班是不满意的，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抵制。在发展工人运动中，要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既要联合又要强调独立自主，对国民党限制扼杀工人运动的措施与活动，基层作了很多机智有效的针锋相对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但在全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委会问题上，国民党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叫朱学范出国，把干部一分散，借口什么什么

不完备，就予以登记，我们就宣布结束。我到武汉，就与黄致祥、吴永裕等同志了解研究当时各工厂工人怎么组织起抗敌后援会的，他们讲这是国民党组织的，我说，我们应当利用这个组织形式来开展工作。果然，一些厂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发展工作是有效的。当时是否可以考虑筹建武汉市工人抗敌后援会总会或其它名义的统一的工会组织？当然，国民党可能象限制工抗总筹委会那样限制我们，但工抗总筹委会毕竟能进行几个月的工作，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是长江局派刘群仙、廖似光同志在那里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采取组织、团结工人抗日的一种形式，而且有影响，使工作发展到那个程度也是一个经验。问题就是我们对国民党的压制、打击没有进行坚决有效的斗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教训之一。

其次，省委在徐州失守战局变化的情况下，没有及时讨论研究战局形势和把工作重点即时转移到农村去，以致没有作到把能派出的干部及早尽量派到农村去，更没有作到动员组织大量失业工人、学生到农村去，却执行王明提出“像保卫马德里一样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使我们本来有限的力量留在城市里，做保卫武汉的宣传、游行等等活动。当时省委也不知道在五月份内，党中央对战局的发展和党在华中的任务曾连续发出过三次重要指示。其中，五月二十二日指示长江局，要马上成立鄂豫皖省委，把省委的主要负责干部派到鄂豫皖省委去工作，要立即组织一些游击队的基干队伍，开展游击战争，把失业工人、学生大批动员到这些地区去，即使武汉城市的工作遭受部分损失也在所不惜。可是，长江局不但向省委传达，反而提出“像保卫马德里一样保卫大武汉”。（黄致祥同志插话：聂鹤亭同志到利济路小学作游击战争的

报告，听报告的工人里三层外三层。汉阳兵工厂工人听了报告以后回来就问我们，什么时候去打游击，说枪炮子弹都在我们手里，我们读书会、工作团的团员都是运输队长。说明我们的同志在工人群众中辛辛苦苦作了大量工作，当时有多好的群众工作的基础和有利的条件啊！如果当时省委及时集中研究了徐州失守后的形势，而又重视了工人群众要求拿起武器打敌人保家乡的迫切愿望，就是不知道中央这些明确具体的指示，我们也可以下决心组织大批失业工人、学生到农村去打游击，组织兵工厂的工人拿起武器弹药，组成游击队的基干队伍。武汉失守前后，在鄂东、鄂中和其它地方发展游击战争的形势就会大不一样了。正是由于省委没有这样做，丧失了大好发展时机，使武汉的工人阶级没有能够更好地发挥他在抗日民族游击战争中的作用。省委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关于“保卫大武汉”问题。从当时动员群众来讲，提这个口号是可以的，但要“像保卫马德里那样”就不对了。我们在提保卫大武汉的同时，一定要指出武汉是保不住的，只有站在武汉的外围去武装保卫武汉，这才是动员群众参加武装抗日斗争积极性的正确方针，否则会麻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模糊了群众的斗争目标，影响群众的斗志。当时，连国民党也正在把武汉的工厂搬走，他也不知道是没有办法保住武汉的。武汉和长江流域一带很快沦为敌占区，这跟日本人占领了平津、太原，使华北沦为敌占区相类似。华北能迅速发展游击战争，大量地武装群众，很快建立了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是华北局正确指导方针的结果。如果华中当时没有王明错误的干扰，认真及时地贯彻中央精神，局势就会大不一样了。这是严重的经验教训，应很好的记取。

最后，就我所知（我是九月下旬离汉的），在我没有离开

武汉前，由于缺乏预见和周密的考虑，对不久会沦陷的武汉，在撤退以前没有布置安排党的地下工作力量，这对继续从事在敌占领下的斗争和对工人运动的工作是有损失的。

今天就讲这些，是否对，请讨论指正。

注 释

①指董必武

②指周恩来

在抗战初期武汉工运史 座谈会上的发言

陈用文

郭老讲的很好，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历史情况。很多事情是从事基层实际工作的同志不大了解的。我们是糊里糊涂地被关起来了，外面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一直到延安我们找到你（指郭老）才弄清楚了一点，还没有你今天讲的这么详细。郭老今天的讲话是很宝贵的，对我们这次座谈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实际的指导思想。不然，我们就会没有方向。他这一讲，来龙去脉就清楚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抗战初期武汉工人运动方面的很宝贵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很好学习。大家再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把情况从各个角落、各个方面把它弄清楚。

我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离开延安的。我到了武汉三道街三十九号蛇山外国语补习学校。杨学成、蒋南翔、杨述这一批同志在那个地方。我从延安出来，要工作。杨学成跟我谈话，说你就准备到农村去。这说明那个时候（三七年十二月）就提出了要到农村去。没有走之前，那个青年救国团就热闹起来了。我在三道街住了两三个星期，在那里一个是唱救亡歌曲，还编歌，作曲子；再一个就是参加了一次进攻珞珈山（打游击）的演习。这个演习是在武汉大学进行的。我还写了一篇《进攻珞珈山》的通讯在那个小组上登出

来了。那个小报是青年救国团办的，叫《战时青年》。所以说，三七年底在青年救国团的工作上，我来到武汉就碰到这个事：打游击。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考上了汉阳兵工厂。我考上了汉阳兵工厂后，组织上要我就在汉阳兵工厂工作，不到农村去了。

到了汉阳兵工厂，有救国会的关系，还有党的关系，他（吴正东同志）在汉阳兵工厂搞了工作团。工作团也搞打游击，请了聂鹤亭来讲课。下了工之后，我专门到汉口（不知什么街）秘密地去听聂鹤亭讲游击战争。工厂的工人去的多，都去听。这件事说明，三七年底三八年初，党就在群众里面、学生里面、工人里面，宣传、组织打游击。这些问题，我看与王明投降主义路线没关系（刘季平同志插话：那个时候，搞讲游击战，办游击训练班，王明是反对的）。

再有一个，我刚才听了几位同志的讲话，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要把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与中央的正确路线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中央的正确路线是什么呢？是统一战线，标志国共合作，这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即要广泛深入地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抗日，而且要组织、团结各种力量到抗日救亡的战线上来。这是中央的方针。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是讲“三个一切”即：“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个是投降主义的，要肯定。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央提出的正确路线，是要充分放手地发动群众，争取公开合法。这就是在国民党统治下面，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争取公开合法，来开展我们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这两者的关系和区别有个政策界限，不能够把争取公开合法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混为一谈。从我们工作团的情况来看，我们是利用公开合法，而且利用得很好的。但是

我们并没有投降，并没有一切经过它，而是由我们独立自主地活动的。工作团所以是这么开展，就是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结合。那时候，我们是在地下，党的关系是单线关系。后来我才知道，汉阳兵工厂的党员在我们那个时候就发展到了二十多个人。当时我只知道一个黄致祥，一个吴永裕，还有我那个小组的两个党员，别的我就不知道，因为是单线关系。那时候就是公开与秘密的结合，合法与非法的结合，我们的工作独立自主的。形式上，我们那个工作团就在国民党汉阳兵工厂特别区党部楼下。我们宣传、讲演、唱歌用它的礼堂，我就站在它大门口讲演，对工人说话，公开宣传，我抗日无罪，救亡有责。好多人都到那里讲演，钱俊瑞、沈钧儒、潘梓年等都去过。这个有很大的成绩，跟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不能低估，不能说这都是投降主义的。后来，黄致祥同志讲，那是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你要放开手，工人就要打游击，要拿枪、拿炮、拿子弹，因为东西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样一来，他怕你破坏他的统一战线，就要你老老实实地装船到重庆去。后来省委在临上船时又来要我们赶快拿枪拿子弹，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个确实是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造成的恶果和损失。要不然，我们汉阳兵工厂的工人搞武装，搞根据地的人就多了，因为它从“二七”以来就有光荣革命传统。